

## 引 言

公元 1449 年的一个秋天，在距北京仅约 100 公里的一个军事小镇上，发生了一幕震惊历史的悲剧：明朝皇帝英宗亲自率领的明军主力遭到蒙古瓦剌骑兵的袭击，50 多万军队全军覆没，50 多位朝廷重臣伏尸疆场，明英宗被掳塞外。顿时，明廷内外一片恐慌，朝局陷入动荡，各种政治势力暗流涌动，矛盾盘根错节。辉煌一时的明王朝，虽然暂时摆脱了倾覆的厄运，但由此走向了衰落。突如其来的失败，使明朝新都北京城直接面对了蒙古铁蹄的威胁。幸好在于谦等人的主持下，百姓积极抵抗，才终于使它转危为安。古老的北京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变得更加宏伟壮丽。

这一事变既造成了北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也给整个中国历史抹上了沉重的一笔。它警示了北京作为中原王朝首都的特殊战略意义，同时也预示着中原汉族王朝内在的危机及多民族融合、全国大一统局面终将来临，北京的首都地位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由于事情发生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史称“土木之变”。

## 一、往事烟散今何在 唯余寂寞土城墙 ——土木堡印象

土木堡，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为乡政府驻地，在今怀来县城（沙城）东南约 8 公里处，距其东南的怀来旧城（明朝时怀来卫治所，清朝、民国怀来县治所，今为官厅水库淹没）约 10 公里，距北京城约 100 公里。

土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当时它是为了抵御北方异族而设置的一个军事小镇。辽朝时，皇帝游猎、出巡时常经过此地，并在此地张幕安营，作为临时指挥所，从此，这儿就有了“统幕”之名。后来，逐渐讹为“土木”。元朝人陈孚曾有诗描述当时的土木：“千里茫茫草色青，乱尘飞逐马蹄生，不知何代开军府，犹有当年统幕名。”可见当时的土木还是个荒凉之地，但已经是有名的军镇和驿站了，否则，何来马蹄声疾、尘土飞扬的景象呢？

土木所处正好是延庆——怀来盆地（或称妫川盆地）的盆底，近乎中心的位置。而延庆——怀来盆地连同往西串接的涿鹿盆地（或称桑乾盆地）、宣化盆地（又称洋河盆地），在古代曾有妫州、儒州、可汗州、云州、武州、新州、归化州等设置，被并称为“山后诸州”，是北京通往西北草原的第一个台阶，也是西北与中原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中的中继

地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这片盆地的底部，约在海拔五、六百米之间，周围山岭阻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这里无论从经济还是民族关系上看，都呈现一种混合形态。这儿可耕可牧，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农耕经济的汉族，都可在这里长期居住耕牧，因此成了北方民族进取中原与中原汉族反扑草原战争的拉锯地带，也是民族和睦时相互往来、相互贸易的交通要道。由此去草原可分为两路：一路自延庆向北，经雕鹗堡、赤城到坝上；另一路自延庆往西，经怀来、宣化、张家口到坝上。上坝以后，便是茫茫的大草原了。

如果走第二条路，土木则是必经之地。在古代，尤其元朝以后，出北京城经榆河（今海淀玉河），出居庸关，再经榆林堡、怀来老县城、土木堡、新保安、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往北或往西而到草原，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驿路，被称为西北干道。驿路约每 60 里设一驿站，之间 30 里设一军站，用以传递公文、接待来往官客。土木就是其中的一个军站，在此有官军把守。

如果你站在土木往北眺望，你会看到一个由开阔到狭窄、纵深曲折的喇叭形山口。原来这土木附近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峡谷河沟，当地人称为炮儿沟或石河沟。由这条沟曲折往北，翻越长安岭即可到达赤城、云州、独石口，来到茫茫大草原了；往西北，可穿麻裕口，奔宣化、张家口。也就是说，在土木之北的这个山口隐藏着两条通往草原的岔道。这两条岔道往往成为进攻者偷袭之路，“土木之变”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可见，土木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在这个盆地又显得至关重要。

土木往南，地势渐低，望去是一马平川。古代，东有妫川蜿蜒而来，西有桑乾河穿流而过，如今，都已没入了官厅水库那一汪澄碧的水中。完全可以想像出来，如果成群如蚁的军队从北边那个山口涌来，只要冲破横挡在喇叭口的土木堡，就势不可挡地奔往东南方向的居庸关了。掩映着居庸关的那一片苍茫山岭就在官厅水库对岸清晰地矗立着。

如果你来到如今的土木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段高大、古朴的土城墙。它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穿过村庄的东西南北，显示着这村庄不同寻常的历史。村东和村北还可以看出有内外两道城墙。仅从残存部分看，城墙高有 7~8 米，顶部厚 1.5~2 米，基部厚 2~3 米，全部由黄土夯实而成。城门、角楼、瓮城、烽火台等部位则更显坚固，不仅更宽、更高，而且增加了砖砌石垒。村外向东，还可见到每隔五、六百米一个烽火台的遗迹。看到这些，自然就会联想到“土木堡”这个旧称，显然，这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军事堡垒；还会立刻想到：这些土城墙是否与“土木之变”有关？它们是“土木之变”的经历者、目睹者还是事变之后的产物？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及走访当地文物部门的干部和土木村的老乡得知，今日所见这仍然高大、颇有规模的土城墙，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 年）<sup>①</sup>，即“土木之变”后的第五年。系于谦主持朝政，不遗余力地整顿、加强北京周边地区防御系统的时候修筑的。以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曾加以补修。显然，这是“土木之变”惨痛教训的产物。清朝人朱乃

<sup>①</sup>（清）朱乃恭《怀来县志》卷 5《城池》引旧志。台湾 1970 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图 1 土木堡东门遗迹

恭，曾任怀来地方官，在其主持编修的（怀来县志）卷 5 里介绍明朝所修榆林、怀来、沙城、土木、新保安等一系列城堡时说：“城池之建在腹内为犹缓，而在边疆则最急。当万马奔驰之际，雷击电掣，非有高城深池以限其冲突，又何所不至哉！明正统土木之役苟有一城斗大足以自守，虽败衄不至已甚此。”依他看来，土木之败，重要原因是没有高大的城墙可作防御。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土木之变”以前，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和驿站，这儿是有一道防御设施的。县志记载，“永乐初年置堡，正统末车驾驻此北狩，堡遂毁。”<sup>①</sup>也就是说，在土木事变以前，这儿曾有一个城堡。它是什么样的？有多高多大？不

<sup>①</sup>（清）朱乃恭《怀来县志》卷 5 《城池》。台湾 1970 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得而知。如果依朱乃恭的观点，这个城堡一定不够高大，也许只是一个土围子，因而不能阻挡蒙古马的轻轻一跃。这或许有些道理。

依据乡村间的传说，最初建堡时，有一和尚云游到此，指点说：土木位于山口河沟之上，应建成船形方可无虞。因而土木堡建成了东西长、南北窄、两头略尖的船形。笔者经考察认为，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土木堡建成这个形状的实际原因可能是：第一，贯穿土木堡的西北驿道是东西向的，沿驿道而设驿馆、旅店、小吃铺等各种服务设施是很自然的，因而房舍分布呈东西狭长的形态；第二是土木之北是一个喇叭形山口，城堡筑成东西长的形状，等于拉长了面北的防御线，使之像一道挡板横在了喇叭口上。

景泰五年(1454年)，于谦主持加强北京防务，沿西北干道筑起了一溜儿城堡及烽火台。在土木则依原堡基础修筑了一个新城。除了将原来被毁的城墙修补完整、增高加宽并增挖护城壕外，还在城北墙外加筑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城，使之成为有船舱的船形，或说官帽形，并更名为太平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又进行了增修，使该城的规模达到：城高11~12米，厚3米多，周长约1200米，护城壕深2米多，宽6米多。瓮城、关城、烽火台一应俱全，应该说十分坚固耐守了。这是谭纶、戚继光整顿北京边备、大修长城时期的一系列成就中的一个。

“土木之变”留给当地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遗迹，是堡内的显忠祠。显忠祠始建于景泰初年，是明廷为祭祀土木之役前后，宣府、土木等地阵亡将士而建的。祠中竖立了包括英宗朝时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高官显职在内的 66

位阵亡将领的神位（其中有文武官各一人是清朝时发现增补的）。明宪宗为于谦等人昭雪时，对土木之役也作了重新评价，特地重修了显忠祠，并御笔题写了祠匾、碑文。当时的显忠祠占地约 3150 平方米，南北长 70 米，东西宽 45 米；坐北朝南，三间正殿，东西配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设南、北两道山门：第一道山门挂匾“显忠祠”（宪宗御笔）楹联：“一代忠贞光祖俎，千秋气节壮山河”。第二道山门匾写“大节凜然”，楹联：“隆千秋事典，表一代忠良”。正殿楹联“故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

后显忠祠年久失修坍塌，又遭受火灾危害，烧残殆尽。万历年间，得以重修，祠堂高大而壮观。清初，祠堂复被战火烧毁，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又重建。民国时期，当地人民也曾捐资修缮。几经劫难，祠中原立显忠祠初建碑、死难诸臣名刻碑、宪宗时重建祠碑、纪念于谦碑（宪宗御笔）等碑石，今已无存。在“文革”期间，祠的大部分建筑被毁坏，如今只留下正殿的轮廓（图 2）。

显忠祠虽历经沧桑，屡修屡毁。但自明清以来，总有许多文人墨客侠义之士来此沉吟深思、抚古伤怀，留下一篇篇追忆历史、启迪后人的诗文。如现在祠中仅存下来的一块碑石上记有明朝万历年间云中人氏万世德的四首出塞诗：

塞门春去草芊芊，清蹕何因下九天。  
一自真人归大统，至今云气护燕然。

雪裹穹庐拥自重，君王歌吹向黄昏。

莫言冒顿无情者，犹自嵩呼德汉恩。

塞姬倚徙拂新妆，待得君王一笑将。  
多少娉婷觐北极，一时翘首在昭阳。

鼓笳四合夕阳残，无数貂裘拥汉官。  
何幸六龙重入塞，家家犹记唱回銮。



图2 土木堡显忠祠遗迹

又如，原正殿东墙上留有清人德保记述乾隆皇帝路经土木拜谒显忠祠一事的诗：“军行当日出仓皇，遗恨千秋此战场。碧雪至今沉朔漠，丹心终古护君王。垂堂误入奸阉计。勒鼎遥留词客伤。昭代春秋隆祀典，满庭生气溢馨香。”录入怀来旧志之中，感叹“土木之变”的诗文也为数不少，如有一首：“旭景照荒城，行行指土木。据鞍话前朝，铸此一

大错。万乘等儿戏，一掷向沙漠。千官为鬼雄，碧血染剑  
镞。天地十年闭，庙堂三日哭。幸赖瑕甥谋，再造旋乾局。  
不然晋愍怀，无亦徽钦绩。千金戒垂堂，白龙困鱼腹。何物  
小阎竖，青史有余戮。崇祠榜显忠，遗碑不忍读。”

从古人的楹联、诗词当中，感受到的总是一份隐隐的哀  
痛和沉沉的忧思。

如今的土木村比原来的土木堡规模扩大了好几倍。那古  
老的土城墙夹在一片片新式、明亮、宽敞的红砖瓦房之间，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高大气派，而显出几分落寞和不协调。村  
民们有的依此建屋，把它作为自家院落的一道山墙；有的在  
墙根下搭个仓库、围个猪圈什么的；更多的则把这土墙当成  
了取之不尽的黄土之源，不时挖出几筐来垫猪圈、抹篱笆或  
是平整院落……。但是，如今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已经认识到  
了土城在他们村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开始采取某些措施加  
以保护了。这儿的村民几乎人人知道 500 年前他们的村子附  
近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很多人尽管连朝代也说不清，但都  
知道有个皇帝曾在这儿被蒙古人俘虏。问起对这事看法和  
感受，大多数村民一脸茫然，或说：“都好几百年了，谁还  
管他那个！”有的则表示出某种兴奋和好奇，仿佛这件事情  
发生在土木是土木人的自豪，如果能扩大宣传及影响，让土  
木村的这一历史“掌故”和它那古老的土城墙声名远扬，提  
高其文物地位，开发旅游资源，岂不是一桩好事？像有些专  
吃古人饭的地区一样，这儿的村民也希望历史上发生的那桩  
事儿能给他们留下一点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资本。

土木之战的创痛与血痕，在历经五百年的风尘磨蚀之  
后，于今日土木人的心中已变得如此平淡、索然，这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了。面对纯朴而有所期盼的村民们，我们无法再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沉下心来，让时光倒流 500 余年，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去经历一番这场历史事变，那又会有怎样的感受与收获呢？是否还会有无谓的轻松？

且让我们翻开历史的这一页吧！

## 二、风暴频起出塞北 长城环拥明京师 ——明迁都北京及其对蒙古的防御

北京西、北、东北三面环山，它们分别是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分支和余脉，其高峻雄险、错综复杂的山势成为环绕北京的一道天然屏障。在这一片连绵起伏、层峦叠嶂之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和无数的山口，这些盆地和山口是进出北京和塞外的咽喉要道，自然成为历次北方民族入侵中原所首要冲击的目标和中原王朝重兵扼守的关口。

明代沿这些盆地和山口设置军事据点和防御工事，构成了保卫北京的内外两道防线。其中，西北部地区的外线防御据点有偏关、大同、宣府、独石口等，这一线可以把敌人挡在坝上、草原一带；一旦失守，敌人便可以沿洋河、桑干河谷地进入怀来、延庆盆地，接近北京。第二道防线包括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等关隘，是北京的生命线。明朝形容说：“居庸关是我朝的背，紫荆关是我朝的喉，一旦失守，则喉被掐，背遭击也！”<sup>①</sup>

除这些赫赫有名的派兵常守的险关要塞外，还有许多狭窄、隐蔽、荒僻的山口，如笔者前往土木考察时途经的上、

<sup>①</sup> 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一《形势》。

下口这条路，在古代就是一条荒僻的山谷小路。有的学者怀疑，这条山谷很可能就是公元 1213 年成吉思汗攻打金朝时，大将哲别绕开重兵把守的居庸关、东谋突破所走的那条“札八儿小道”。当年，成吉思汗欲取金朝中都（今北京），但金王朝早已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如熔化铁汁浇灌居庸关关门，又派重兵把守，还在居庸关外百里间撒下了许多铁蒺藜，所以居庸关难以攻破。蒙古大臣札八儿提出：由居庸关外向东北行，有一条掩映在黑森林中的峡谷小路可通关内，但崎岖狭窄，仅可供一人骑行。成吉思汗速派大将哲别率精锐骑兵“勒兵衔枚”，悄无声息地在札八儿的向导下，日暮入谷，一夜急行军，于黎明时分金兵尚在酣睡之时，天降神兵一般占领了南口，从后方包抄了居庸关，从而打开了通向中都的大门。这条蒙古兵进军的山林小道，人称“札八儿道”。如今，这里已有宽阔平坦的盘山公路了。但在五、六百年前，像这种曲折幽深又极为狭窄的山谷，自然是除本地人之外所鲜为人知的了。正是这些隐蔽的小路很可能成为入侵者的突破口。所以，如何消除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山沟所带来的隐患，就成为古代北京防御系统上的大问题。

如今，无论你是从居庸关奔宣化、大同，还是从古北口往承德、赤峰，只要往北，你就能看到长城。长城是横亘于北京北部天然屏障之上的一道蔚为壮观的人工屏障。它从山海关蜿蜒而西，在平谷县的将军关附近进入北京市界，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及门头沟等 6 个区县，沿北部山区呈现出环抱北京小平原，拱卫北京城的姿态。这是明朝人为了守住北京的生命线，在前人修筑的旧长城基础上重新修筑而成的一个奇迹。

今天，人们在参观游览八达岭、慕田峪、金山岭等处的长城时，无不赞叹其连绵起伏、势如巨龙的雄姿，无不赞美其精巧的设计、高超的建筑艺术。的确，长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心血和不屈的精神。岂不知，在当时，它只是出于单纯的防御目的，出于一种被动保守的心态和精卫填海式的精神。尤其是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是在“土木之变”过去若干年之后，当时的明朝廷内在危机已深，既害怕外患，但又无扫清门庭我自岿然的魄力和信心，于是就以一道长长的、厚实严密的砖墙，想堵死所有沟通北京与塞外的缝隙，消除类似“札儿道”的隐患，一劳永逸地守住墙内的祖宗寝陵及子孙万代的乐土。这其实多少带着一点无奈的味道！

当时最令明朝人心悸的乃是蒙古骑兵的马蹄声。

明灭元朝后，元顺帝率蒙古势力逃往漠北。明大将徐达曾问太祖朱元璋：“要不要穷追？”朱元璋说：“元运已衰，行将自灭，不烦穷兵。赶他出塞后，只须固守封疆，防备着他们侵扰即可。”朱元璋之所以不穷尽追剿，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原久被战火，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另一方面，是对蒙古人回到大草原之后，明军能否克胜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元蒙势力得以残存、恢复和发展。后来虽然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但强悍不减，彼此经常仇杀不说，还时不时地侵扰明帝国的边境，成为始终威胁明朝安危的巨患。于是，北京（明初称北平）自然成为中原抵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前哨阵地。

朱元璋对蒙古采取了努力通好、积极防御的政策。首先，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沿旧长城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它们是：辽东（今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

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绥德,成化7年移至榆林)和稍后建立的宁夏(今银川)甘肃(今张掖)蓟州(今天津蓟县)及太原、固原等,即所谓九边。九边之外,还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东胜(今呼和浩特附近)三个外围军事重镇,声势相连,互为犄角。每个军事重镇管辖若干个小的军事据点及其驻扎军队,即卫和所(每个卫下辖5个千户所,1个千户所又辖10个百户所)。其中专门针对北平的防御中心是蓟州、大宁、开平、宣府、大同等镇及其下属卫和所(见附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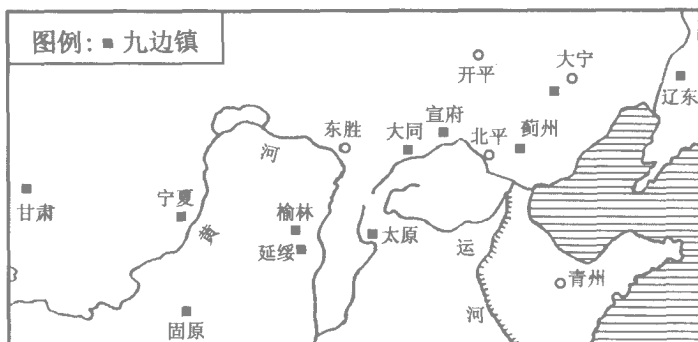


图 3 明朝九边图

而北平城的军事建设则早在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之后就开始了。当时,朱元璋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北平原北城垣内缩,将北部空廓地带弃于城外,同时加高城垣并改土夯为砖砌,以利防卫;二是在北平府设6个卫所,驻扎重兵。洪武六年(1373年),接受华云龙的建议,沿旧长城自永平、蓟州、密云以西,在2000余里的防线上设关隘129个,置兵常戍,增设紫荆关、芦花岭两个千户所以加强重要关口的

防备力量。此后，又不断充实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等处兵力，增设关隘、烽火台数百处。这些星罗棋布的哨所、关隘构成一道防护网将北京紧紧围护起来。

其次，就是重修长城。长城起源于先秦时期诸侯互防的列城、长垣。秦始皇统一后，利用战国时秦、赵、燕三国长城，向东西延伸，西起甘肃临洮，东至鸭绿江，连绵不断，长约万里，故称万里长城。它久历汉、魏、隋、唐等朝，已是破损不堪，又兼辽、夏、金、元时期的战火冲击，更加残缺不全。朱元璋攻克大都后，立即命令大将徐达主持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关隘长城。当时，国家初定，又急于抗击元蒙残余势力，只得简易从事，仅以石块垒砌城体，规模也很小。其后，伴随着陆续在旧长城一线建起了许多关口、哨所，对旧长城也就不断进行了修缮和巩固。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连年不断，但在“土木之变”以前，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规模。

除加强军事防备之外，朱元璋多次从山西、浙江等地大规模移民至北平一带，开垦荒地。结合各卫所开展军屯、民屯，恢复地方经济，充实边防。直到今天，大兴、顺义、延庆、密云等地的一些村庄还沿用着移民前老家的地名；族谱上也明确记载着洪武初年从别处迁来的经历。移民为加强边防，稳定戍边军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在加强北平防御力量的过程中，不仅以他最得意的儿子朱棣为燕王，率集大量兵力驻扎在此，而且派出了他的大部分精干将领，如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孙兴祖、郭英、华云龙、曹良臣、冯胜等协助燕王。他们皆为开国元勋，大多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治军有方。

如此诸多名将不仅有效地捍卫了北平的安全，而且为北平城市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洪武年间，北平府犹如一个巨大的练兵场，徐达及许多驻守北平，甚至不常驻北平的宿将，如汤和、沐英等也先后来到了北平，有的指挥练兵，有的构筑防御工事，有的开荒屯田。二、三十年间，北平被建设成了一个集城防坚固、边备系统、军需充足、兵精将强的强大军事基地。明王朝的军事重心逐步北移到了北平，北平再次成为牵动中原王朝命脉的军事中心。朱元璋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加强了对北方民族的防备力量。但是，这就好比一柄双刃剑，大将在外，难免形成拥兵自重格局。尽管像徐达等对朱元璋是忠心耿耿，不致对朝廷形成危害。但后来，燕王朱棣由此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大位并一举迁都北京，可以说与朱元璋的最初意图就相违背了。不过，这也是以北平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切实得到加强的有力证明。

燕王朱棣，系朱元璋第四子，胸怀韬略，智勇过人，很受朱元璋器重。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被分封到北平，称“燕王”。随着北平军事地位的上升和实力的增强，燕王成为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立，慑于诸王叔拥兵自重的威胁，采齐泰、黄子澄之议，决定削藩，剪除诸王的势力。善于等待时机的朱棣便以“清君侧，靖祸难”之名，率其它诸王举兵发难，直逼王位。结果，朱棣胜，成为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

朱棣登基，同样要削藩，只是他的手段比较隐蔽和巧妙。他先是为已被削夺的藩王复藩，其后很快以“纵戮取财”等罪名削夺了“代王”（踞大同）势力，接着剪除了拥兵边塞的“岷王”等北方诸亲王的势力。然而，削藩之后如

何加强和保持北面的防务？永乐帝决定迁都北平，一则北平是他的发祥地，二则地近北面边防，天子居此，正所谓居重御轻，可以直接加强对北边的防御。

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帝定北平为京师，称北京。原京师改称南京。为使北京具备一个首都所需的条件与规模，他下令修浚大运河，使得南方的粮米和丝帛等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北京。他大规模兴建北京宫殿城苑，将旧北京城进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布局精巧、气势宏伟的一座新都城。至今，北京旧城仍保留着明永乐时开创的基本城市格局。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正式迁都北京。至此，北京上升为明朝新的政治中心。永乐迁都在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明朝巩固北部边疆，而且对于日后经济文化的南北沟通、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全国的大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政治中心的确立与经济力量的加强，也使得北京具有了维系社稷兴衰存亡的根本和国之命脉的重要战略地位。

永乐皇帝的本意是要更加加强北京的防御能力。他采取的是比较主动的措施，一方面继续与蒙古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争取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如果蒙古贵族进行挑衅，则坚决予以打击。朱棣曾五次亲率大军，远征漠北，有力地打击了蒙古的侵略气势，保障了边疆的安全。但是，由于他在“靖难之役”中得到过蒙古兀良哈部的援助（他借过蒙古骑兵），因此，他把大宁卫地盘送给了兀良哈，将大宁、开平、东胜三个军事防御建置内迁到河北等地。如此，原来的大宁、辽